

# 被褐而懷玉——中國隱士的形象經營與自我期許

胡 翼 鵬

**內容摘要：**古代隱士經營形象、表達自我期許的形式多種多樣，其中，衣著是一種重要的方式。大多數隱士堅持穿著素樸的衣裝，葛巾草服、芒屨布衣是他們的慣常著裝，甚至舊衣破衫、奇裝異服在他們之中也屢見不鮮。這種著裝情狀雖然與個人的經濟條件和審美情趣相關聯，但更主要的是，隱士希望外在的衣著形象與內在的品格節操形成強烈的對比，即“被褐而懷玉”。隱士不僅在日常行動中以葛巾草服示人，而且在与帝王、官貴等訪客的互動中也堅持穿著山衣野服，由此，通過不斷地反複強化，隱士憑藉衣著成功經營了一種返璞歸真的形象，有效表達了一種安貧樂道的自我期許。

**關鍵詞：**中國隱士 形象經營 自我期許 衣著

隱士是古代中國一種身份獨特的人物，他們本來可以憑藉德行與才學步入仕途，但卻主動選擇遠離宦海而隱遁林谷鄉野，表現出迥異於世俗之人的價值取向。不過，隱士並不一定都藏身山川，他們大多還是混跡於芸芸眾生之中，晉人王康琚《反招隱詩》雲：“小隱隱陵藪，大隱隱朝市。”<sup>[1]</sup>置身市井閭巷之中的隱士，不僅沒有混同於凡俗之人，反而表現出超凡脫俗的品格。那麼，隱士是如何經營自己的獨特形象的？而世人又如何從滾滾紅塵中辨認出那些品節超群的隱士？從眾多隱士的事蹟來看，衣著是他們塑造形象的一種重要憑藉，也是他們表達自我期許的一個重要側面。歷代史籍文獻如《高士傳》、二十五史的隱士傳記中，多有描繪隱士衣裝狀況的文字。

## 一

多數隱士的經濟狀況不佳，有些隱士實在太窮了，甚至沒有衣服可穿，於是只好赤身裸體。漢末隱士焦先“冬夏袒不著衣”，而且常常就地而臥，沒有被褥鋪陳，赤身裸體滾在土裏。<sup>[2]</sup>而西晉楊軻生活清貧困苦，“人不堪其憂，而軻悠然自得”，猶如簞食瓢飲的孔門高足顏回。西晉滅亡後，楊軻羈留長安，後趙國君石季龍軟硬兼施，希望他能為其所用，但楊軻不為所動，故意放浪形骸，“常臥土床，覆以布被，裸寢其中，下無茵褥”，（《晉書·隱逸傳》）也是睡臥不起，赤身裸體滾在土中，於是世人稱頌楊軻是前輩高隱焦先的傳人。

也有一些隱士模仿上古先民，就地取材製成簡陋的“衣服”遮羞禦寒，與那些赤貧的隱士相比，他們的處境稍微好一些。魏晉之際的孫登，孤身一人隱居在山洞裏，“夏則編草為裳，冬則披發自

[1]梁蕭統編，[唐]李善注，《文選》卷22，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02，691。

[2]晉皇甫謐撰，《高士傳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，123。

覆”，夏天以野草遮羞，冬天披散自己的長髮取暖，完全是一種返璞歸真的自然生活狀態。（《晉書·隱逸傳》）而南朝劉宋時期的隱士翟法賜則住在高山頂峰，修行導引之術，不食五穀糧食，“以獸皮結草為衣”，（《宋書·隱逸傳》）把草結成線繩，縫獸皮為衣，這類衣服雖然比赤身裸體強一些，但取材於大自然，製作水準也很低，是非常粗劣的。

絕大多數隱士的衣著雖然正常，但也只是極為普通平常的、甚至有些破舊的村野衣裳。譙秀隱居鄉里，顯貴仰慕其美名，備厚禮請他作官，但他不為所動，而寧願“常冠皮弁，弊衣”，親自在山間草澤中耕種自給。（《晉書·隱逸傳》）著名詩人陶淵明隱居期間生活窘迫，其自擬形象五柳先生，家徒四壁，簞瓢屢空，衣服也是“短褐穿結”，破了縫、縫了破。<sup>3</sup>而東晉郭文隱居深山幽谷之中，“恒著鹿裘葛巾”，穿著鹿皮衣服，包著葛布頭巾，是平常不過的衣裝。（《晉書·隱逸傳》）南朝劉宋隱士周續之精研佛老，決意斷絕塵世負累，終身沒有娶妻，“布衣蔬食”，穿粗布衣服，吃粗淡飯食，也過著典型的普通人的生活。（《宋書·逸士傳》）南朝梁張孝秀辭官歸隱後，廣有良田、部曲，但他性情通達，不喜浮華，“常冠穀皮巾，躡蒲履，手執並欄皮麈尾”，雖然並不窮困，但還是戴穀皮頭巾，穿蒲草鞋，麈尾也是棕櫚皮做的，沒有絲毫富貴氣息。（《梁書·處士傳》）南宋隱士蘇雲卿的園藝高超，“布褐草履”，一年四季不見變換，看外表是個樸實的農人，但待人接物彬彬有禮，卻迥異于田夫村豎。（《宋史·隱逸傳》）

隱士的衣著如此簡樸，有的甚至連衣服也算不上，最直接的原因固然是他們經濟困窘，沒有財力置辦像樣的衣裳。不過，有些隱士還是有不錯的經濟能力，吃飯穿衣不成問題，但他們仍舊傾向於著舊衣，穿草鞋，給人一種或困苦不堪、或返璞歸真的印象。當然，與其說這是隱士的一種偏愛或嗜好，不如說這種著裝行為正是他們忠實踐行一種角色規範的表現。

由於隱士與芒屨布衣的頻繁組合，這種衣著表現就與人們預期的隱士形象不斷重疊，並經過不斷的積澱，於是人們對隱士的身份形象就形成了認知慣性、甚至惰性。一方面，隱士有意無意地以葛巾草服展示形象，於是芒屨布衣也就成為了隱士的慣常著裝；另一方面，人們也接納了隱士的這種角色形象，衣服與身份形象之間形成一種對應關係。芒屨布衣、葛巾草服成為隱士的標準形象，而且在流佈接受的過程中，衣著也成了史家、文人的認知焦點，成了標識隱士情趣和形象的象徵。因而，葛巾草服與隱士的清素形象合為一體，隱士返璞歸真的超然形象也深入人心。

唐代史學家劉知己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：“大唐修《晉書》，作者皆當代詞人，遠棄史、班，近宗徐、庾。夫以飾彼輕薄之句，而編為史籍之文，無異加粉黛於壯夫，服綺紈于高士者矣。”<sup>4</sup>唐初史臣房玄齡等人皆是著名文士，嫻熟辭賦文章，但他們拋棄了司馬遷、班固開創的史書寫作規範，過分講究辭藻華麗，結果使《晉書》的文字風格與史家傳統並不相符。劉知己以壯年男子不宜施胭脂粉黛、隱士不可穿錦繡綢緞，類比說明史籍之文不得輕佻跳蕩。這種修史觀點準確與否姑且不論，值得注意的是此句修辭的喻體“服綺紈于高士”。比喻的基本準則是以直觀易懂的常識，來說明抽象

<sup>3</sup>[晉]陶淵明著，逯欽立校注，《陶淵明集》，“五柳先生傳”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，175。

<sup>4</sup>[唐]劉知幾撰，黃壽成校點，《史通》，“論贊”，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7，240。

深奧的道理。在這個語境中的常識之一，即是隱士不得穿錦繡綢緞，說明隱士必然衣衫粗陋、素樸已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認知和刻板印象。

不惟如此，隱士與素樸衣衫的絕妙搭配，又進一步衍生為審美的意趣和定勢。宋人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說：“煙霞泉石，隱遁者得之，宦遊而癖此者鮮矣。謝靈運為永嘉，謝玄暉為宣城，境中佳處，雙旌五馬，遊歷殆遍，詩章吟詠甚多，然終不若隱遁者藜杖芒鞋之為適也。”<sup>5</sup> 煙霞泉石、山水草木本為自然風景，徜徉煙霞、寄情山水也是文人情趣。不過，風景之美，在於看風景的人以之為美。無論是二謝優遊泉石，還是隱士放曠煙霞，在此都構成了風景。在後世文人看來，二謝優遊泉石的風景，其境界卻比不上隱士放曠煙霞的情致。無他，二謝之游，車馬闐咽、人聲喧嘩，官家聲勢、貴胄威儀實在與鐘靈毓秀之自然美景不搭調，因此官貴的吟詩賦章也終究不若隱士的藜杖芒鞋得林泉之真正意趣。隱士之所以能夠得山水意趣，就在於藜杖芒鞋，在於藜杖芒鞋與山川美景渾然天成、相得益彰。由此，藜杖芒鞋不僅成就了隱士的高潔形象，而且成為彰顯隱士之超凡意趣的象徵。

正是由於衣裳不僅僅是隱士的穿著，而且成為其身份形象和品格意趣的象徵，所以古人賦予隱士的衣裳種種雅稱，如山衣、草衣、樹衣、荷衣、荷裳、薜蘿衣之類。這些稱謂無不以自然天成昭示出隱士超凡脫俗、返璞歸真的品格。其中，荷衣、荷裳是最有韻味的美稱，屈子《離騷》曰：“製芰荷以為衣兮，集芙蓉以為裳。”用荷葉制成的衣裳，與隱士之取材天然的衣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，於是這種瑰麗的想像就成為隱士之高潔品格的隱喻和象徵。如錢起《送鄒三落第還鄉》曰：“荷衣垂釣且安命，金馬招賢會有時。”又劉長卿《喜朱拾遺承恩拜命赴任上都》曰：“詔書徵拜脫荷裳，身去東山閉草堂。”

## 二

芒屨布衣、葛巾草服是隱士標識身份與經營形象的符號，衣服被賦予一種象徵意義，似乎只有衣衫粗陋濫褸才更“像”一個隱士。這與中國古人对衣服的认知和规定既有联系，又有区别。古人早已認識到，衣服不僅具有禦寒護體的功能，還有遮羞審美的作用。《墨子·辭過》認為，穿衣服的目的在於“適身體，和肌膚”<sup>6</sup>，班固解釋“衣裳”說：“衣者，隱也，裳者，鄣也，所以隱形自鄣閉也。”<sup>7</sup> 衣裳可以防寒禦暑，可以掩體遮羞。而《釋名·釋衣服》則說：“凡服，上曰衣，衣，依也，人所依以蔽寒暑也；下曰裳，裳，障也，所以自障蔽也。”<sup>8</sup> 上為衣而下為裳，上衣可以防寒禦暑，強調其實用功能，下裳可以掩體遮羞，強調其倫理功能。其次，衣服具有審美功能。《韓詩外傳》說：“《傳》曰：衣服容貌者，所以悅目也。”<sup>9</sup> 既雲“《傳》曰”，可見這是來自經典的現成知識，

<sup>5</sup>[宋]葛立方撰，《韻語陽秋》卷13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，172。

<sup>6</sup>[清]孫詒讓撰，《墨子間詁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，30~31。

<sup>7</sup>[漢]班固撰，《白虎通義》卷8，“衣裳”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，850-59上。

<sup>8</sup>[漢]劉熙撰，《釋名》卷5，“釋衣服”，見《字典彙編》[25]，北京：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，1993，22上。

<sup>9</sup>[漢]韓嬰撰，許維校釋，《韓詩外傳集釋》卷1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，25。

也說明穿衣打扮是為了賞心悅目乃古已有之的常識。

另外，古人也認識到，衣服具有區別社會等級的功能。賈誼指出：“奇服文章，以等上下而差貴賤，……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，望其章而知其勢。”<sup>⑩</sup>古代的官服就是用服裝款式、顏色和圖案來標識等級區別，而黎民百姓在著裝上也有款式、顏色的嚴格規定，《後漢書》說：“非其人不得服其服”，（《輿服志》）平民的衣服不准有紋飾，稱為“白衣”。歷朝歷代都有“服禁”，漢高祖劉邦曾下令，“賈人毋得衣錦繡、綺縠、絺紵、罽”。（《漢書·高帝紀》）商賈屬於庶民，社會地位很低，儘管有經濟能力穿著錦繡，政府卻規定不准他們穿用，以免淆亂等級秩序。不過，平民百姓只准穿白衣而不得有文繡，這是制度規定，更是生產水準的限制。諸葛亮《出師表》說：“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。”<sup>⑪</sup>明太祖朱元璋也稱自己出身布衣：“朕本淮右布衣。”（《洪武實錄》卷37）他曾教導兒子憫農、愛農時說，農夫“所居不過茅茨草戶，所服不過練裳布衣”。<sup>⑫</sup>所以，無論從制度規定，還是從經濟能力，普通民眾的衣著都以質樸為本色。

從衣著打扮來看，隱士與普通百姓沒有什麼區別，但由於葛巾草服被賦予了象徵意義，超越了衣服的本來特質，既不是防寒禦暑、掩體遮羞，也不是標示其社會等級地位，而是高度符碼化了的標識，成為隱士展示社會形象的標誌符號，是隱士內在人格特徵的外化形式。問題是：隱士為什麼要以芒屨布衣、葛巾草服來經營形象、表達自我期許，並且得到社會輿論的普遍認可呢？筆者以為，這與來自文化傳統的知識、思想和價值取向相關，尤其是與作為歷代士人選擇隱逸的觀念淵源——儒、道思想資源密切相關。

安貧樂道是自古就廣為稱頌的高節美德，孔子說：“君子謀道不謀食，君子憂道不憂貧。”（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）君子只謀求真理而不求飲食，只擔憂不能得道而不在意貧窮。又說：“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”（《論語·襄仁》）道是一個神聖而高遠的目標，求道的過程必然任重而艱辛，一個人如果不能忍受衣食的粗劣，那麼他一定也難以忍受精神的困厄。如若一個人並不因衣食貧乏而擾亂其心，而是把精神追求作為首選，那麼這樣的人才是高尚的人、有道德的人。先賢顏回就是堅守清貧的典型模範，“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”。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孔子十分讚賞顏回“安於貧而樂於道”的品德，這也是後世隱士安貧樂道的精神皈依。孔子說自己也吃粗糧，喝白水，彎著胳膊當枕頭，“飯疏食、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”。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生活雖然如此艱苦，但孔子卻在這種困頓中體味到了求道的樂趣，實際上也是一種為追求真理而安于清貧的崇高境界，這同樣對後世隱士的價值取向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
外在表象與內在品質之間的反差凸顯出高尚人格，也是古代隱士以芒屨布衣、葛巾草服經營形象的思維依據。《老子》第七十章說：“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，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。”<sup>⑬</sup>南宋范應元釋曰：“聖人內有真貴，外不華飾，不求人知，與道同也。”<sup>⑭</sup>有道的聖人總是穿著粗布衣服，而懷裏

<sup>⑩</sup>漢]賈誼著，吳雲、李春台校注，《賈誼集校注》，“服疑”，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9，46~47。

<sup>⑪</sup>三國]諸葛亮著，《諸葛亮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。

<sup>⑫</sup>清]谷應泰撰，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卷14，“開國規模”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。

<sup>⑬</sup>三國]王弼注，《老子道德經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6，42。

<sup>⑭</sup>宋]范應元撰，《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直解》，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2002。

揣著美玉。褐，是下層民衆的衣服，由麻毛撚成線，再編織縫紉成衣，質地粗糙，樣式鄙陋。而玉，是上層人士的佩飾，《禮記·玉藻》說：“古之君子必佩玉。”古人賦予玉多種精神品格，如孔子曰：“君子比德于玉焉：溫潤而澤，仁也；縝密以栗，知也；廉而不劌，義也；垂之如隊，禮也；叩之其聲清越以長，其終訕然，樂也；瑕不揜瑜、瑜不揜瑕，忠也；孚尹旁達，信也；氣如白虹，天也；精神見於山川，地也；圭璋特達，德也；天下莫不貴者，道也。”（《禮記·聘義》）玉具備儒家宣揚的全部倫理道德，質地細膩，潤澤有光而不炫目，扣之聲音清越，通體呈現含蓄而柔和之美，是君子人格美的象徵，故《詩》曰：“言念君子，溫其如玉”。（《秦風·小戎》）聖人身穿最卑微的裘褐，懷抱至寶貴的美玉，雖然外形樸實無華，但心胸卻高潔博大，似碧玉一般清明可貴。故而“被褐而懷玉”就造成一種表象與內涵的錯位，所謂“戰士食糟糠，賢者處蒿萊”。（阮籍《詠懷》三十一）而隱士雖然衣裝粗劣、晦跡山林，但卻是參天得道、人格高潔的君子。

一些隱士是後世的榜樣和範本，這些原型隱士安貧樂道、被褐懷玉的節操和品質就是通過破舊的衣裝體現出來。例如，孔門弟子原憲“華冠縱履”，戴著樺皮帽，穿著破爛無後跟的草鞋，是一位典型的安貧樂道的高士。另一孔門弟子曾參也是一位品節高尚的隱士，“緼袍無表，顏色腫噲，手足胼胝，三日不舉火，十年不制衣，正冠而纓絕，捉衿而肘見，納履而踵決”，整一整衣襟，手肘就露出來，提一提鞋，腳跟就露出來。儘管如此困頓，他們卻淡泊寧靜，彰顯出隱逸的巨大大德力量，“曳緼而歌《商頌》，聲滿天地，若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”。（《莊子·讓王》）

大約正是基於安貧樂道、被褐懷玉這種先在的價值預設，不少隱士有意無意地追求外表衣裝與內在品格的落差和對比，文人与史家也不遺餘力地大力渲染隱士身穿葛巾草服的高潔形象，於是使人們對隱士、隱士衣著的認知就形成了刻板印象。而通過衣著來表示自己被褐而懷玉，也就成為隱士經營形象、表達自我期許的常見方式。

### 三

由於芒屨布衣、葛巾草服被賦予標識個人形象、展示獨特情懷的重大意義，故而有些隱士在穿衣打扮上煞費苦心，刻意穿著舊衣野服、甚至奇裝異服，藉以宣示一種與眾不同的人格特徵，經營一種特立獨行的身份形象。衣服是隱士彰顯個性的語言，也是他們標榜形象的符號。

東漢隱士梁鴻有令名，權貴人家都想把女兒嫁給他，但他都謝絕了。有孟氏之女三十歲了，屬於超齡女青年，而且“狀肥醜而黑，力舉石臼”，但擇偶很挑剔。父母非常著急，女兒表示想嫁隱士梁鴻。梁鴻聽說後，就下聘禮迎娶孟氏。孟氏盛裝打扮來到梁家，梁鴻看到她的裝束，七天沒有理會她。孟氏詰問緣故，梁鴻曰：“吾欲裘褐之人，可與俱隱深山者爾。今乃衣綺縞、傅粉墨，豈鴻所願哉？”孟氏解釋說，自己如此盛裝打扮，不過是為了考察一下自己的丈夫是否有真心向隱的志向罷了，“妾自有隱居之服”，於是拿出早已準備好的隱逸之服，改變儀容，換上荊釵布裙，梁鴻高興地說，這才是我梁鴻的妻子。（《後漢書·逸民傳》）這篇充滿小說筆法的傳記，是一個關於被褐

而懷玉的隱逸佳話。梁鴻夫婦關於衣著打扮的戲劇性衝突，生動地展現了隱士對於穿衣的刻意和講究。衣服是個人品格的標誌：衣錦繡綾羅，就是平庸的俗人；而著葛巾草服，就是高潔的隱士。荊釵布裙、裘褐舊衣是隱士的標準服裝，也是隱士安貧樂道的表徵。

由於荊釵布裙、裘褐舊衣意味著安貧樂道，甚而標識著其人“被褐而懷玉”，於是一些本來衣食無虞的隱士也刻意穿草鞋、著布衣。韓績出身官宦之家，父親官至東吳大鴻臚，但他卻“以潛退為操，布衣蔬食”。（《晉書·隱逸傳》）而南朝的何點家世顯貴，本人又博覽群書，談吐不凡，應該說居官顯達不成問題，但他卻潛心向隱，“不簪不帶，或駕柴車，躡草履，恣心所適，致醉而歸”，除了行為舉止不拘小節，其衣裝、車駕也沒有一點富貴氣息。因為家世煊赫，衣錦繡、駕香車不是問題，因而何點這種駕柴車、穿草鞋的清素形象就不是被視為寒酸，而是被稱為脫落形骸、返璞歸真，於是時人美其名曰“通隱”。（《梁書·處士傳》）

因而，一方面，隱士以葛巾草服展示形象，世人也接受了這種角色形象，葛巾草服成為人們辨認隱士所依據的形象特徵。另一方面，努力通過衣著、特別是非常態的著裝來暗示自己被褐而懷玉，也就成了古代隱士的慣用手法。東漢嚴子陵是光武帝劉秀的同學，劉秀當了皇帝，他卻隱姓埋名不知所處。劉秀派人按其形貌尋訪，許久之後，齊國報告“有一男子，披羊裘釣澤中”，劉秀斷定此人就是嚴子陵，於是多次派使者前去禮聘，最終把嚴子陵接到了洛陽。（《後漢書·逸民傳》）劉秀作出判斷的關鍵依據是“羊裘”。裘褐是一些隱士彰顯個性、標榜形象的常用道具，劉秀之所以能夠“辨認”出老同學，是因為裘褐表徵隱士已是一種得到廣汎認可的共識或常識。皇甫謐的《高士傳》就記錄了不少衣褐披裘的隱士。春秋時期的披裘公是一位視金玉如糞土的高潔隱士，吳公子季剡看到路上丟著一塊金子，示意披裘公去撿，披裘公拒絕道：“五月披裘而負薪，豈取金者哉？”言語之間有著另類的自豪與不屑，而這種氣概的根源就是那件皮襖。吳地五月已經是炎炎暑熱，但這位高人卻穿著皮襖，可見是非同一般的世外高隱。另一位特立獨行的隱士林類，“底春披裘”，與披裘公一樣，也是穿衣非常不合季節。<sup>⑤</sup>這些不按季節穿著裘衣的高隱，傳遞出一種返璞歸真的神秘氣氛，是後世披裘衣褐而甘之如飴的隱士的模擬榜樣。

唐朝隱士朱桃椎澹泊寡欲，絕俗離世，“被裘曳索，人莫能測其為”，裘皮衣服破得成條成縷，但他卻毫不在意，惹得人們紛紛好奇。人們的好奇心映照出隱士衣著怪異的真實目的，即讓人們明白他是安貧樂道、被褐而懷玉的高隱。（《新唐書·隱逸傳》）另一唐朝隱士張志和也非同凡俗，他垂釣卻不用魚餌，又特意穿了一件大號布裘，“雖暑不解”，並不是不怕暑熱，而是要以不合節令的衣服張揚自己那種特立獨行。（《新唐書·隱逸傳》）而明初隱士楊恒在鄉里教書、耕讀，“戴棕冠，披羊裘，帶經耕煙雨間，嘯歌自樂”，煙雨是南方的習見天氣，耕田餘暇讀書大約也是那個時代讀書人的常態。而楊恒的別致之處在於在雨中穿著皮襖，讀書歌詠怡然自樂。（《明史·隱逸傳》）

與披裘、衣褐精神相通的穿衣風格，是北宋隱士魏野的白衣。魏野雖是鄉間農夫，卻格調高雅，不喜歡頭戴巾幘，“無貴賤，皆紗帽白衣以見，出則跨白驢”，（《宋史·隱逸傳》）身穿白色衣服，再

<sup>⑤</sup>[晉]皇甫謐撰，《高士傳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，20、29。

配一匹白色毛驢，構成一種通體純白的形象。不過，在古代服飾中白色屬於凶喪之色，白色象徵素淨而寡欲，故白衣白冠用作死喪之服，表示服此衣者心情哀痛。<sup>96</sup> 不知北宋時期是否流行白色服裝，南宋初期士大夫間流行白色涼衫，但僅僅五六年光景，禮部侍郎王儼認為這種涼衫“純素可憎，有似凶服”，於是政府詔令禁服白衫，從此白色只用於喪服。（《宋史·輿服志》）由此可知，白色為凶的觀念在當時很普遍，魏野以白衣白驢招搖，實是冒天下之大不韙。不過這種誇張放誕行為的心理動機，卻在於以白衣白驢標榜獨特個性，張揚與眾不同的隱士情懷。

舊衣草鞋是隱士的著裝風尚，適度的奇裝異服也是隱士張揚個性的必要手段，但流韻所及，就成為競相模仿的行動，甚至演變為不可思議的變態行為。董京被發佯狂，“時乞於市，得殘碎繒絮，結以自覆，全帛佳綿則不肯受”，（《晉書·隱逸傳》）而另一個隱士石垣，飲食不求精美，衣著但求粗劣，有人送他衣服，“受而施人”，他又轉手施捨他人。（《晉書·隱逸傳》）怪異舉止的心理動機似乎只是為了穿破衣，這種過火表演實際上與安貧樂道、被褐而懷玉等內在超越性已經離得很遠了。

#### 四

衣著象徵人的身份、修養甚至精神狀態，而象徵反過來又是個人體認自我的媒介。在與帝王、官貴的面對面交往中，隱士常常堅持穿自己的本色衣服，這在隱士的傳記文字中多有記錄。本來一個人穿什麼樣的衣服由自己的財力和情趣決定，穿衣也本是為了遮羞、保暖或者美觀，但那些與帝王、官貴交往的隱士卻堅持穿舊衣、著草鞋，其用心別有深意在焉。葛巾草服、甚至奇裝異服實際上就是隱士體認自我的媒介，在隱士經營形象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。

東漢隱士周党，因帝廷多次召喚，不得已只好應徵到官。在謁見尚書時，周党仍堅持隱士之節，“乃著短布單衣，穀皮綃頭”，照舊穿著山野中的慣常衣服。另一隱士法真，當地太守請他相見，“乃幅巾詣謁”。（《後漢書·逸民傳》）據北宋李上交《近事會元·襜頭巾子》曰：“今宋朝所謂頭巾，乃古之幅巾，賤者之服。”幅巾是貧賤之人的著裝，可見法真與太守相見，也只是穿著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衣服。劉宋時期，隱士戴顓居所附近風景秀美，衡陽王劉義季仰慕戴顓，時常追陪遊歷山水，但戴顓並不因此而受寵若驚，“服其野服，不改常度”。（《宋書·逸士傳》）初唐隱士田游岩自比上古高隱許由，唐高宗遊覽嵩山時，曾親自登門拜訪田游岩，田游岩“山衣田冠出拜”，（《舊唐書·隱逸傳》）並未因帝王屈駕下顧而改換衣裝，而是一如既往，穿著村野草服迎接九五之尊。

在古代中國，下級官員拜見上級要修飾儀容、更換禮服，以示尊仰。陶淵明作彭澤縣令時，郡守派督郵到縣視察，按禮儀規定陶淵明須整飭衣冠、修飾儀容才能拜見督郵，只是陶淵明覺得“折節向鄉里小兒”有辱斯文，於是辭官不幹了。（《晉書·隱逸傳》）帝王是九五之尊，臣僚、子民覲見更需講究威儀，而隱士會見帝王時堅持穿著山衣野服、甚至舊衣弊衫，則在於竭力以“例外”彰顯自己是一個合格的真隱士，是一個堅守節操的真隱士。這樣的事例在史書中屢見不鮮。東晉時，張

<sup>96</sup>王維堤，《中國服飾文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，172~173。

忠隱居泰山修煉導引之術，受前秦國主苻堅徵召，來到長安。苻堅賜給他官服、禮帽，張忠堅辭不受：“年朽髮落，不堪衣冠，請以野服入覲。”（《晉書·隱逸傳》）儘管要求穿本色衣裝的藉口是年老體衰，實際上卻是通過草履野服表白了自己堅守隱逸節操的決心。北魏馮亮立志終老山林，世宗多次任命其官職，馮亮都抗命不遵。世宗又要求他朝服禮冠穿戴整齊覲見，馮亮“苦求以幅巾就朝”。（《魏書·逸士傳》）本來，隱士是“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”的方外高人，可以与帝王分庭抗禮而不必折節屈服。而馮亮“苦求”穿戴本色的貧賤衣裝，是一種圓融的處世智慧，以迂迴的方式堅持了隱逸節操。

隱士如此看重衣服，一如清初士人視頭髮重於生命，因為衣服是事關形象和節操的大事。這一點得到了帝王和官貴的同情和理解，於是張忠的堅辭，馮亮的苦求，都獲得了帝王的寬容和善待。也正是因為理解和寬容，一些帝王會見隱士時，主動指示隱士要以草衣野服覲見。梁武帝蕭衍與隱士何點是早年舊交，蕭衍當了皇帝之後，特意寫信邀請何點入宮敘舊，其中有言曰：“文先以皮弁謁子桓，伯況以縠綃見文叔，求之往策，不無前例。今賜卿鹿皮巾等。後數日，望能入也。”（《梁書·處士傳》）何點是隱士，乃方外之人，非但不會行君臣之禮，亦不能要求他改頭換面，脫下荷裳穿上禮服。為了表達自己雖貴為帝王，但只念舊誼、不拘禮儀的寬厚，蕭衍於是援引成例，佈置了與老友的独特聚會形式。光武、魏文之時，文先戴著皮帽子拜見魏文帝，伯況穿著粗絲衣服去見光武帝，既然前代帝王如此尊重隱士的穿著，於是蕭衍也賜給何點鹿皮巾等物。果然，何點沒有讓蕭衍失望，“以巾褐引入华林园”，穿著粗布衣、戴著頭巾，典型的隱士裝束。蕭衍非常高興，賓主交情如舊。另一個與之類似的事例，是初唐隱士武攸緒會見唐中宗。武攸緒與唐中宗是表親，雖貴為皇親國戚，卻矢志隱遁山林。唐中宗召見武攸緒時，特意關照他，“詔見日山帔葛巾，不名不拜”。唐中宗充分尊重武攸緒的隱士身份，除了可以不行君臣之禮外，更突出的優待是拜見九五之尊不必改換慣常的葛巾草服。（《新唐書·隱逸傳》）

在這些帝王與隱士重溫舊誼的互動中，一個被重點突出的對象，就是隱士的衣裝，即極其素樸的、與平民百姓的衣服無不同的普通衣裝。在這種互動情境中，草衣野服成為彼此心照不宣的互動媒介。隱士不僅有意識地通過服裝經營形象，而且也有意識地借助衣著辨識自我。在隱士與訪客之間近距離的互動情境中，葛巾草服充任隱士體認社會評價、整飭外在形象並強化自我期許的媒介。帝王以寬待草衣野服，標榜不拘小節、禮賢下士，而隱士則憑藉草衣野服經營了形象，堅持了節操，雙方互利共贏。特別是隱士刻意穿著葛巾草服會見官貴，常常不是因為卑微貧寒沒有像樣的衣服，而是力圖表明自己安貧樂道、堅守隱逸節操，是純粹高潔的隱士。由此，衣裝更為直接地充當了隱士體認自我、塑造形象的憑藉。因為隱士的典型形象是清貧寡欲、返璞歸真，那麼帝王、官貴等訪客所見的隱士就必須是葛巾草服，才符合經驗預知的隱士形象。隱士本人也必須以葛巾草服表現清貧與素樸本色，才能嚴格履行角色承諾，才能使自己的形象符合人們的預期。如此一來，帝王、官貴和其他訪客充當了隱士反觀自己的鏡子。隱士通過判斷訪客對自己堅持本色衣裝的評價情況，特別是想像訪客可能對自己所表現的隱逸節操的認同與讚賞，從中體認自己作為隱士在社會評價系統

中的位置，從而達成自己作為隱士的角色體認，即隱士通過想像自己在“訪客眼中的形象”，然後依據這種想像進行形象整飭，以迎合訪客先在的隱士印象，使人們認可自己是名副其實的真隱士。當然隱士體認自我、塑造形象的行動並不必然發生在即時的互動情境中，而常常是在理解經驗知識的基礎上，進行多方位的探索與調整。

這些隱士洞悉世人的心理需求，清楚世人嚮往真隱士而鄙視假隱士，而真隱士就是清貧寡欲、葛巾草服，故而隱士選擇穿舊衣、著草服，就在於經營一種高潔形象、表達一種自我期許，最終製造一種社會效應。因此在公共場合、在面對面的互動情境中，隱士都刻意堅持穿著符號化的本色衣裝，向帝王、官員等訪客表明自己的個性形象和自我期許，即寧願作一個安貧樂道、恬淡樂觀的隱士，而不願為一個追名逐利、隨波逐流的庸人。由此，堅持通過素樸的個性化衣裝塑造形象，進而成功引導了世人對隱士的肯定性評價。

**作者簡介：**

胡翼鵬，男，1975年生，社會學博士，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講師。

**通訊地址：**

中國·湖北·武漢·武昌珞珈山·武漢大學社會學系(430072)

**電子信箱：**

nk\_huyipeng@163.com